

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

秦 海

内容提要: 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诸学科中的兴起, 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本文以考察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为主要线索, 兼及“立宪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 力求勾描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实现某种综合的趋势, 以及对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可能的影响。在本文最后, 提出了制度主义实现综合的五个必要条件。

制度,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范式, 一直非常宽泛, 而且经常被日常生活赋予政治、组织和口语习惯上的含义。这些含义因为日常语境和场合, 经常是不需要解释的。制度作为经济学分析的范式, 却因为不同的假设、逻辑以及社会主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些以制度作为理论“内核”的学说, 不仅有他们的“保护带”, 而且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观。

1986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马修斯(R. C. O. Matthews, 1986)在主席致辞中指出, 最近几十年来, “制度的经济学已经成为我们学科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此外, 它要求我们密切地触及社会科学中其它领域的原理, 思想的主体是基于两个主张而发展: (1)制度确实是重要的; (2)制度的决定因素容易受到经济理论分析工具的影响”(Mathews, 1986, 903)。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回顾、阐述和评价不同的制度分析观, 目的是为了对不同的制度分析观进行一次初步的概览。这些不同的制度分析观主要包括旧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最近的分析称之为立宪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历史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

制度经济学: 起源、“新旧”之别与概述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 制度经济学也许是西方经济思想中最主要的异端学派。制度主义发挥了双重的功能: 一方面, 它批判了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 另一方面, 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经济观。制度学派产生于美国, 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包括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在内的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它的开创者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 但是凡勃伦本人似乎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制度主义”或制度学派。1918年12月, 沃尔顿·H·汉密尔顿(Walton H. Hamilton)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上, 提交了一篇题

^{*}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 曾先后得到了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刘鹤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刘世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等的批评与建议。本文可能包含的错误与上述人士无关, 完全由作者负责。

为“经济理论中的制度看法”的论文，首次使用了“制度主义”这一名词。凡勃伦和康芒斯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艾尔斯(Clarence E. Ayres)、卡尔·博兰尼(Carl Plany)、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等人继承了制度学派的思想传统。1966年，美国的一批制度主义者成立了“演化经济学会”(AFEE)，1967年起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JEI)。为了弘扬制度经济学，表彰那些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AFEE于1970年设立了“凡勃伦-康芒斯奖”，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加尔布雷斯、艾伦·格鲁奇(Allan G. Gruchy)和马克·图尔(Marc Tool)等人都曾获奖。在W·萨缪尔斯(Warren J. Samuels)的主持下，该学派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新近又再版重印，其中包括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D·汉密尔顿的《演化经济学》，甚至还包含了J·A·熊彼特的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目前，制度学派的影响已不局限于美国，1988年，欧洲的制度主义者也成立了“欧洲演化经济学会”(EAEPE)，并同时发起了两个基金会——卡普基金会(K. William Kapp Foundation)和米尔达尔基金会(Gunnar Myrdal Foundation)。

A·格鲁奇曾在他的两部专著中对制度学派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作了介绍。在其1972年的著作中，他用“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①来命名这一团体。但是，“新制度主义”一词却并非是格鲁奇首创。实际上，1953年马克·图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名称，该论文的题目是《新制度主义哲学：凡勃伦、杜威和康芒斯》。虽然这一派的理论一直发展着——经过肯尼斯·E·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加尔布雷斯、米尔达尔、格鲁奇、沃尔特·尼尔(Walter C. Neale)、保罗·布什(Paul D. Bush)，一直到当代代表人物华伦·萨缪尔斯、杰斐里·M·哈奇森(Geoffery M. Hodgson)、斯蒂芬·麦德马(Steven G. Medema)和马尔寇姆·卢瑟福德(Malcolm Rutherford)等人，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的制度经济学扩张的过程中，另一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开始得以冠名。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制组织：分析与反托拉斯应用》中最先采用了这一名称，它主要是指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经济史、产权经济学、比较体制、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他认为，它们的共同的线索是：(1)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工具解决事先未意料到的微观经济现象；(2)处理在40年前就被制度主义者关心的“交易”，交易是经济研究的真正的内核，值得重新关注。“与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不同，当今的团体倾向于综合(eclectic)。新制度经济学既来源于微观经济理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分析的补充，而不是替代”(Williamson, 1975, 1)。在威廉姆森所罗列的代表人物中，有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阿蒙·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肯尼斯·阿罗、兰斯·戴维森和道格拉斯·诺斯，同时也包括亚约瑟·科尔奈(Javos Kornai)、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 Winter)等人。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显然，威廉姆森将凡勃伦-康芒斯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旧制度经济学”。但是，威廉姆森的命名在当时可能并不流行。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其所著《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977)一书中介绍了科斯、诺斯等人的理论，却未提及这一名称。这一名词在1984年以后开始流行^②。

① 张宇燕博士主张将 neoinstitutionalism 译为后制度主义，以区别于后来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张宇燕，1993)。我认为，后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名称，还是照译为新制度主义为好，因为在《韦伯英语词典》对“Neo”与“New”的解释几乎是一致的，只不过 Neo 好像更显得有“文化味道”。

② Rudolf Richter, Eirik G. Furubotn 1984年在德国召开新制度经济学国际研讨班。随后，更名创办了《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1984)。

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回顾与新旧之别来看，它们在起源上几乎是同时的，但是在方法论上却是完全对立的，凡勃伦-康芒斯传统的制度经济学是为了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而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是为了给新古典经济学提供补充。

制度政治经济学：从凡勃伦-康芒斯传统以来的制度经济学

美国最早的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对这一传统的追溯一直是制度主义者的学术信仰。1988年以后，在马克·图尔·华伦·萨穆尔斯和哈奇森的共同推动下，先后出版了《演化经济学》（图尔主编，2卷，1988）、《制度经济学》（萨穆尔斯主编，3卷，1988）和《演化经济学：最新进展与制度经济学思想》（三人共同主编，3卷），使人们得以广泛地了解凡勃伦-康芒斯传统的经济学。

凡勃伦是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他是在批判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边际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他的制度学说的。1898年，凡勃伦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中批判他所处时代的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尚不是一种进化科学，不是一种对经济生活进程进行基因性解释的学科。他声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研究仅仅是在进行分类，尚处于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以前生物学的发展状态。边际主义者或者早期新古典主义者虽然成功地创立了价值理论，但在他看来，这种理论的基础——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是错误的。凡勃伦极具讽刺挖苦地抨击了“经济人”概念：

享乐主义的人性观念将人视为一种欢乐与痛苦的高速计算器，像千篇一律的快乐欲念小球一样，在刺激的脉冲下震荡，自身却毫无变化。他既没有先人也没有后代，他是孤立的。……当作用力止息时，他静止下来，又成为如同以往一样的独立的欲念小球（凡勃伦，1898，56—81）。

为了寻找到一种替代经济人的解释，凡勃伦开始在生物学和社会生活中寻求抽象：

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物种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处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改变（凡勃伦，1899）。

同时，凡勃伦认为：

谈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的一般类型或主要类型所形成的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也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中的特有方式；因此，反过来说，它也是淘汰的有力因素……变化中的制度也是以促进具有最相适应的气质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淘汰，足以使个人的气质与习性，通过新制度的构成，对变化中的环境作进一步适应（凡勃伦，1899）。

而制度的适应性过程，在凡勃伦看来并不是主要的，主要方面是制度的变化方式以及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性可能就构成了一个习惯：

关于适应过程的性质……还是次要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使制度变化和发展。制度必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

会的发展。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的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凡勃伦，1899）。

同时，在凡勃伦看来，适应性与环境互动构成的习惯表现为一种行为或观念的强制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给人们留下了精神态度。

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习惯适应的产物，在他后期的思想中，制度干脆就成了“一种自然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一种公理化和不可缺少的东西”（凡勃伦，1923）。凡勃伦的制度演进是“思想习惯的适应”^①。但是，查阅凡勃伦的分析，凡勃伦并不认为自己的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称自己的研究为制度经济学的是康芒斯。

康芒斯的制度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他看来，为了保证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安定，需要某种集体的控制，这些控制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以主权的形式行使。1931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第21卷）上发表了《制度经济学》一文，“定义制度经济学的困难在于一种制度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有时，一种制度似乎意味着法律框架或个人作为公民行动的自然权力；有时，意味着公民的行为。有时，替代或批评古典或享乐主义经济学的任何尝试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有时，‘经济行为研究’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有时，‘动态’替代‘静态’、或‘过程’替代商品，或行为替代感觉，或集体行动替代个人行动，或管理替代均衡，或控制替代自由放任，似乎都是制度经济学”（Commons, 1931, 648）。这一定义是非常不清晰的，在很大程度上含糊其辞，到后来，在两卷本的《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似乎仍然保留了模糊不清的定义。

我们所谓的制度，是自家族、有限公司、工会等乃至国家，具有使其运转的行为准则的营运企业（going concern）……制度是控制个人活动的集体行动（Commons, 1934）。

我想，康芒斯之所以对制度给予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定义在于他特别关心当时的产业社会的组织或待组织的状态，因而他认为“集体行为将所有的未被组织的习惯带入了许多组织的营运企业……集体行动在习惯的未被组织的形态下是十分普遍的，甚至比有组织的营运企业的形态下还普遍，显然，营运企业也是习惯”（1934, 69—72）。这种闪烁其辞的定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习惯。按照他对交易的强调，实际上是为了说明组织状态的重要性，而组织状态是来自习惯的。因此，维克多·万伯格（Viktor Vanberg, 1994）在论述制度演化时，说康芒斯旨在找到合理的价值，以便实现合理的资本主义。

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也基本上与凡勃伦、康芒斯是同期的制度主义者。但是，他对制度的定义是在研究商业周期和特殊的周期扩散过程中形成的。根据马克·帕尔曼（Mark Perlman, 1978）的解释，米契尔在早年是主观主义者，接受的是奥地利经济学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但是米契尔30年代在研究商业周期——特别是研究19世纪后半期金价波动的过程中发现，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商业周期的理论（主要是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不足以认识波动的更深刻的原因。于是，他开始皈依制度主义。

假如他（维塞尔）愿意利用心理学，他或许可以提供更好的理论……市场上发生

① 凡勃伦认为，“社会进化是气质与思想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的压力下的淘汰过程。思想习惯的适应是制度的成长”。这一表述后来得到了演化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的广泛引用（Foss, N. J. 1994）。

的每一件事件都被认为是有一个事前的机制所决定的……然而,严肃的研究似乎已经脱离了正统的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欲望是因为恰当的社会习惯而被标准化的,这些习惯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具有长期的历史记载(Mitchell, 1937, 255—257)。

因此,米契尔最终向决定商业周期的原因分析中带入了制度和心理学。他认为,“制度,在广泛流行和高度标准化的社会习惯中,它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术语”(Mitchell, 1937, 385)。应该从高度标准化的社会习惯来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

从上述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和分析。科斯对他们的评价是“美国制度主义者们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在考虑新古典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们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付之一炬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Coase, 1984)。这是一个非常刻薄的评价。

第一代制度主义者的代表作问世后不久,就迅速进入了一个沉沦期,这是一个思想史的事实。把人们从沉沦状态唤醒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物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第三代人物努力的结果。在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代人物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是博尔丁、加尔布雷斯、艾尔斯以及米尔达尔、图尔等人。在这里我们选择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作出评述。

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与其它的旧制度经济学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为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所接受的人物,1968年曾经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博尔丁自诩为“伟大的旁观者”,但是,他的经济学思想是从凯恩斯主义皈依“制度经济学”的。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和平经济学》(1945)和《经济学的重建》(1950)。在《经济学的重建》中,他主张经济学应该走向新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强调存量而非流量,强调资产而非收入,强调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而非劳动和资本的价格。虽然在《经济学的重建》出版的前一年,博尔丁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颁布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但他似乎已经背离了他在战前所关心的经济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主流经济学问题),1953年他出版了《组织的革命》,探讨大企业的伦理学问题,随后他又出版了《意向》(1961)、《20世纪的意义》(1965)和《经济动态学》(1978)。在这些著作中,他将生物学的概念,特别是将生态平衡类比为经济运行中的价格均衡,形成了他的演化经济学观念。1981年,博尔丁又出版了《补贴经济学:爱和畏惧的经济》,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规范经济中的交换制度是有机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三种方式之一,其它两种方式是战争的威胁和补贴方式,他所谓的补贴方式是指,政府单方面赠与的货币、商品和劳务转换为支付、馈赠和慈善捐赠等方式,这种单方面的转让不是例外,而是规范的交换经济的双方相互转让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因此,博尔丁主张补贴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现代经济中赠与的社会效应。

博尔丁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是将它带进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试图与主流经济学进行对话。美国经济协会1957年年会对博尔丁50年代涉及制度主义的著作进行讨论。格鲁奇对博尔丁重建经济学以及对制度主义的异议表示了严重的非议。他认为,博尔丁的分析挑起了对美国制度主义者的道德和科学攻击,同时,博尔丁将制度主义看成是对基本经济理论的非议运动,这在根本上没有把握制度主义的实质。当时参加讨论的F·奈特(Frank H. Knight, 1957)却显得更加意味深长,“除了时间和个人的局限性,我面临着特殊的尴尬:作为研究计划上的对手——‘撒旦’是圣经上的词汇——但是事实上就如同他人一样,我确实是制度主义者……在其准确的历史含义上,我也憎恨正统理论,即使在最纯粹的纯经济理论上,这些东西都

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却没有驱使我谴责乘法表、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其它的概念、定律,而使用另一种制度主义者的诅咒。同样,憎恨正统理论也没有驱使我否定通过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和出售,为了效率,人可以从事经济化的活动和组织。”实际上,博尔丁是美国制度主义者和正统的新古典主义者(当时的新古典正处于形式化阶段)都颇持非议的人物。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而且经常与“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联系在一起。加尔布雷斯一生著作甚丰,与“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称谓相衬的著作基本上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不确定的年代》(1977)以及晚年的回忆录《我们时代的生活》(1981)。

《美国的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是加尔布雷斯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奠基之作。这部书主要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体系。他首先认为,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中,一家公司无法做到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抬高自己的价格,牟取高额利润,因为竞争者会乘机低价多销。同样,在雇佣、采购等环节也不能压低价格,因为市场有人愿意出高价。所以说,市场给买卖双方提供了寻求第三方的制衡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市场的制衡力量已渐渐消失,买卖之间的默契削弱了第三方的存在空间,垄断势力已经不容忽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垄断重建竞争机制却是“一把纸剑”。因此,“在抵销大公司经济实力所必须的组织难以形成时,就应当寻求政府的援助”。加尔布雷斯认为,抵销力量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工会。“人们发现最强大的工会都在美国,而支撑美国市场的都是大公司”。“抵销力量”的概念提出之后,1953年底美国经济协会第66届年会召开了一个特别分会讨论这一概念。当时,正值年轻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就曾召唤同伴“该去听听他们怎样击溃加尔布雷斯”。由于加尔布雷斯将市场看成是一个由竞争驱动的制衡机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均衡),没有一套价格理论,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大公司的实质,相反却带来了“允许垄断继续存在”的误解。

当然,加尔布雷斯并没有接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对美国社会进行制度的批评和讽刺,他以后的著作陆续形成一个“加尔布雷斯式的”体系。我们可以初步作以下的归纳:

第一,生产者主权理论。在工业发达和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消费者主权已经让位给生产者主权。生产者自行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价格,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信网和营销网劝说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听从于生产者的指挥。生产者主权产生的两个广泛的经济效应是整个社会的权力转移和公司的新目标。加氏认为,一定社会的权力是由要素的控制权决定的,但是,因为生产者主权的出现,在公司内部出现了一个专门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决定了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开始从资本供给者手中向专门知识阶层转移。同时,专门知识阶层不再追求公司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的“稳定”和“增长”以及特定的“技术兴趣”。技术兴趣开始替代利润最大化。

第二,二元体系理论。加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由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大公司经济,它们以计划体系为依托,另一部分是分散的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它们受命于市场。这两个部分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元体系”。“二元体系”普遍体现在加氏的著作之中。《丰裕社会》就是“个人丰裕”与“社会贫乏”的二元体系。实质上,他的“二元”是“丰裕”与“贫乏”、“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二元。

第三,以信念解放为基础的结构改革理论。加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无疑需要全面的改革,但是,改革必须从信念解放入手。在此,他继承了凡勃伦的衣钵,认为把人们的思想从当前流行的时尚中解放出来,必须对传统进行评估,消除工业制度所赋予的不平等和社会紧张,保证社会的和谐和保障。这样,就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结构改变,矫正二元关系,实现权力均等,运用法律和经济措施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公共目标应该成为国家的目标。

加尔布雷斯的影晌是非常巨大的,后世的评价是“一个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但却驻足于经济学主流之中的经济学家”(Lester C. Thurow)^①。与博尔丁不同,加氏自称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神甫”——根据英国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的看法,他试图影响的是“通情达理的知识界的舆论,并进而影响政界人士,而不在于拉他的本行同事和他一起走”,同时,因为他既不接受可通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等等),也没有形成一套形式化的理论,从他的以信念解放为基础的结构改革主张来看,加尔布雷斯是一个“制度浪漫主义者”。

第三代制度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是华伦·萨穆尔斯和英国的G·哈奇森。这一代制度主义者更加强调整化和综合。以萨穆尔斯为例,他认为,制度主义的准确含义是,市场经验是一个系统的自我扩散过程(emanation),制度主义遵循的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对政治经济提供问题导向的解答,同时制度主义试图创造一个知识主体论的思想。因而他们强调经济比市场更重要,应该使用动态化的、演化的和历史的方式研究经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对于研究个人的行为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社会集团、强制和过程的研究,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则更加重要。

尼尔(1988)曾经尝试使用“硬核”以及辅助性假设等科学哲学的概念来重新厘清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定义为人类活动(people doing)、规则和大众观念(folkviews),并提出了博弈规则(rules of the game)的思想。哈奇森(1997)对制度的定义则更加开阔:“(1)伴随着关键的信息反馈,所有的制度包括代理人之间的互动;(2)所有的制度都是具有大量特征化的和共同的观念和日常惯例;(3)制度维护共同的观念和预期,且被共同的观念和预期维护;(4)即使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道德的,制度相对具有耐久性、自我强制性和永续性(Persistent qualities);(5)制度融入了价值和规范的估价过程,特别是,制度增强了它们自身的道德合法性:这一持续的过程无论如何经常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正义的。”

按照美国旧制度经济学第三代代表人物的总结,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制度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的实际问题;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制度变迁来解决人们实际面临的问题;研究的方法是过程性的,研究的目的是社会过程,以便为社会过程提供实际的解释和因果的理解;社会价值判断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规范-实证分析的两分法必须放弃;所有演化中的政治-经济都是内植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个人就是这一过程的产品,也是这一过程的生产者;知识的增长和它作为技术的应用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任何政治经济都是一个权利系统;新古典分析具有局限性,“自由”市场过程的自发调整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距离仍非常显著,整体主义仍然

① 关于加尔布雷斯的学术评价可以说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因为他本人做过记者、大使、政客和大学教授等多种职业,197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作为经济学家才没有争议。他一生出版过报告文学、小说、日记、游记以及专业经济文献。在写作风格上,一直是文体优美、冷嘲热讽,语出惊人。萨缪尔森一向是美国经济学家中的文体大师,他对加尔布雷斯文体的评价是,他是社会科学家中似乎很流行的那种不关心写作笔法习惯的一个例外。

是他们替代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努力目标。他们坚信,最恰当的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具体地说,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处于孤立状态下的个人,人是“社会人”。个人的社会经验,在时间中演变的学习过程,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都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个人选择是植根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那种认为人的选择是在内化于独立的个人偏好基础上作出的个人主义决策,即个人选择不受他人决策及自身习惯之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想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述是,他们是制度政治经济学或者是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制度经济学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科斯 1937 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科斯对这一点完全认同。“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我的确切地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的论文《企业的性质》,这可能是对的”(Case, 1998, 72)。虽然这一术语是威廉姆森的发明,但是,科斯似乎并不属意于这一说法。早在 1984 年首次召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科斯虽然发表了与会议名称“新制度经济学”一致的演讲,但是,他更属意的名称是“当代制度经济学”(Coase, 1984, 229-31);在 199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致辞中,他将他的研究称为致力于寻求“生产的制度结构”,没有提到“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在每 5 年出版一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历》(1995)一书中,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企业内的协调成本以及它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受到它从其它企业购买投入品的能力的影响,而后者提供投入品的能力部分地取决于它们协调的成本以及它们所面临的交易成本。这些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样受到它们在其它企业的状况的影响,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的关联的结构”(Coase, 1995, 245)。在 1997 年 9 月成立的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上,科斯发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危险和机会》^①的演讲。他认为,以罗宾斯-凯恩斯-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经济学是不现实的,仅是“一种经济学方法”或“一箱分析工具”,他引用了一句现代诗人的诗句:“我看到了完好的马鞍和马嚼子,但那受伤的马儿在何处呢?”。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必须给它们添加制度作为躯体。“人类社会的生活取决于商品及服务的流量,而这些流量又取决于经济体系的生产率。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体系的生产率取决于专业化(他指的是劳动分工),但专业化只有在存在交换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交换的成本越低(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交易费用),专业化程度越高,同时系统的生产率也越高。但交换的成本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它的法律体系,它的政治体系,它的社会体系,它的教育体系,它的文化等等。就结果而言,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而正是这一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家而言显示出重要性”(Coase, 1998, 73)。

同时,科斯强调:

经济学的另一特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显著。抛开理论的形成不讲,这么多年来我们观察经济系统的方式显得特别停滞不前。经济学家们经常因为以下这一事实而感到骄傲: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论是在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及亚当·斯密的著作之后而产生的结果。

^① 这篇文章后来以《新制度经济学》为题发表在 1998 年 5 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Ronald H. Coase(1998):“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8(2), 72-74.

但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方面的进展与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发展形成了对比。生物学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生物学家对支配具有活性的有机体发挥功能的复杂结构,已有了详细的了解。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将在经济学方面取得相似的成功。但这将非易事。……此外,法律、社会系统、文化的影响,就如同技术变迁的效应——比如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部分)戏剧化降低的数码革命,你将得到一组复杂的相互关系,其本质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吸引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当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学都将成为今天我们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Coase, 1998, 73)。

从上述的引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斯似乎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或完整的研究内容。在他笔下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除了他本人之外,还包括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诺斯等人。他所谓的“当代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新古典分析工具的具体应用。

能够鲜明地区分和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家的,并不是他们讨论制度——当年美国的制度主义者们也谈论制度,也不是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尽管他们(当代制度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修改了现行的经济理论,而是他们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支持和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Coase, 1984: 229-231)。

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威廉姆森。他于1975年发明了这一术语,并给定了这一术语所对应的研究领域。在1985年威廉姆森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契约》中,他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描述。他认为,“企业、市场和关系契约是重要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系列令人着迷的组织创新的演化的产物。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Williamson, 1985, 15)。他认为,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经济制度研究的低潮期,60年代早期开始走向复兴,70年代是它的潜行时期,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线索——企业作为生产函数被治理结构替代了,1975年是新制度经济学走向大众化的一个标志,80年代开始走向扩张(Williamson, 1985, 16)。

威廉姆森的这些说法都有明确的验证:60年代早期的贡献是科斯(1961)对社会成本的重新概念化、阿尔钦(1961)产权描述的先驱性文献、阿罗(1961, 1962)对信息经济属性的描述以及钱德勒(1962)的企业史研究;70年代是威廉姆森(1971, 1973)将交易成本运用到垂直一体化的研究以及市场与等级制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 1973)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和团队生产的分析以及创造性地使用产权理论,戴维斯和诺斯(1971)的经济史研究,彼德·道瑞英格尔和米契尔·皮耶皮(Peter Doeringer and Michael Piore, 1971)的劳动市场分析以及科尔奈(1971)的反均衡分析;1975年之所以是一个标志是因为威廉姆森出版了《市场与等级制》一书;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扩张是因为具有新制度主义者精神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于1980年创刊,1984年更出现了《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简称JITE)。

威廉姆森在1985年这部著作中认为,交易费用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也可以等同于新制度经济学,他对其研究内容的定义是:

1. 交易是基本的分析单位;
2. 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或简约地转换为缔约问题,并根据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处理;
3.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匹配交易与治理结构来实现的,因此交易的属性

需要识别;可供选择的治理结构的激励和适应性属性需要描述;

4. 尽管边际分析方法有时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包含离散的制度选择的比较制度评价,一个极端的方式是评价古典市场缔约,另一种方式是评价集中化的、等级制的组织,企业和市场组织是居于其中的混合的形式;

5. 任何试图处理经济组织研究的严肃尝试,都必须运用与资产专用性条件有关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联合的分支概念(Williamson, 1985, 41-42)。

1985年夏季JITE国际会议上,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反思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组织理论与法律之间的交叉地带,他认为,许多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在外表上仅是凑合的,仍是相互独立的。理论需要重新定义,数据需要重新处理和评估;政策分歧需要更加细致地解决”(Williamson, 1985: 191),并且他认为,“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发展新的、不同的或更加深刻的应用,那么它太值得被埋葬了”(Williamson, 1985, 191)。因此,他认为,以研究企业、市场和企事业部门的关系契约为己任的新制度经济学还应该包括:

- 家庭组织;
- 非盈利组织的模式;
- 官僚政治理论;
- 与演化经济学的融合;
- 政府组织的理论;
- 评价名誉效应的效力和极限,等等。

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诺斯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是经济史,他创造性地将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组织分析运用于经济增长过程的解释(主要是欧洲的经济增长)。

诺斯是所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中唯一给出制度定义的经济学家。他对制度的定义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之间互动的约束”(North, 1992)。同时,他认为,必须将制度与组织分离开来。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法律法令、共同法、规章条例)、非正式的约束(惯例、行为规范和行为的自我强制)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强制。组织是游戏的参与者,是具有实现目标的共同意图约束的个人集团。它们包括政治集团(政党、参议院、市政委员会、管理机构)、经济集团(企业、贸易团体、家庭农场、公司)、社会集团(教堂、俱乐部、体育协会)、教育集团(学校、大学、职业培训中心)。整个经济发展或者说历时经济绩效的形成就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当然,这一变迁过程是以产权的有效性和交易费用的节约为线索的。

诺斯认为,在工具理性的世界是不需要制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并不重要,有效的市场——既包括经济的市场,也包括政治的市场——才构成了一个经济的特征。他认为,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同时处理信息的心智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需要利用一系列的制度来约束人们之间的互动以便构造交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结果的制度是有效的。在这样的世界中,思想和意识形态在选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交易成本导致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因此,制度理论起源于对工具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减少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技术的配置,他们决定了交易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制度和它们进化的方式形成了历时的经济绩效(North, 1992)。

从上述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一些基本的主张^①,它并不是要否定新古典主义。恰恰相反,它致力于将新古典经济理论更加一般化。如果我们采用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术语,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仅仅是试图调整新古典学派研究纲领的“保护带”,使之成为更具有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这种调整是通过引进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安排等约束条件进行的。至于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硬核”,如经济人和稀缺性这些基本公设和均衡分析等基本方法都被保留下来并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史、组织理论和市场演化等很多领域。马修斯认为,他们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产权、机会主义和经济变迁,而且使用的是逐个的案例研究,而不能进行形式化的表述,他们的理论可以还原到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Matthews, 1986)。

西蒙(Simon, 1991)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企业活动的范围和运行的研究,它试图解释什么时候通过市场来执行这些活动,什么时候通过企业来执行这些活动,并试图解释这些活动的有效运行在企业中怎么成为可能。他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这两个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认为这一研究有时候是通过“信息不对称性”或“不完全信息”进行表达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合约安排的研究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他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整体上是与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容的,但是,它确实广泛地增加了大量的辅助性的外生的假设,这些假设对于理论的作用是必要的”(Simon, 1991)。但是,西蒙也对新制度经济学提出警告,“一般来说,在组织和决策研究中,相对于辅助性假设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严肃地从经济著作吸取教训。然而,它确实是对新古典理论的颠覆,因为它建议微观经济学经验著作的全面的研究议程,必须用以评估外生的参数和经验地测定的理论。但是,直到研究已经被执行(和已经被考虑的关于组织和决策的既存的文献),新制度经济学和相关的分析仍然是信仰的行动,或者是虔诚的行动”(Simon, 1991)。

我的看法是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术语^②,即使他们声称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为

①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被科斯、威廉姆森以及诺斯等人提到的当代制度经济学家,据我所看到的文献似乎他们都不使用“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比较突出的是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巴塞尔等。

② 我之所以这样的断言,主要是基于两个特别简单的事实,一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思拉恩·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 1990)所出版的著作《经济行为与制度》,这本著作是在诺斯的指导下形成的,并且受到了诺斯的大肆赞扬,埃格特森将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三个层次:产权和组织的模型化,组织交换的内生化 and 交易成本把社会、政府规则以及政治制度结构内生化的。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在埃格特森看来就是三个内生化的。这一表述实际上将所有的经济学都看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在埃格特森(1996)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将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财富的科学,制度就是文化。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可以说埃格特森的著作造成了重大的混乱。另一个事实是师承威廉姆森的彼得·克莱因(Peter G. Klein, 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科斯的(1937)的企业性质分析,哈耶克(1937, 1945)的知识论和钱德勒(1962)的工业企业史研究,它具体包括西蒙的管理决策理论、戴维斯和诺斯的经济史、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理论、麦克纳尔(MacNeil, 1978)的关系契约理论和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 1979)的代理理论等等,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就是关于支配每天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具体的理论包括企业理论、道德风险和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的能力和核心能力、契约理论、组织理论、公共政策选择理论等等,是经济学、法律、组织理论、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等相综合的理论。实际上,这一表述已经与旧制度经济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此外,还有埃里克·G·菲吕博顿和鲁道夫·瑞切特(Eirik G. Fumbotn and Rudolf Richter, 1991)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按照哈耶克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传统建立起来的理论,它的研究中心是“产权制度和治理产权的获取或转让的规范的体系……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分析应该在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法与经济学中进行”,诺斯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第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威廉姆森(1985)指出,虽然这一领域的文献在表面上类似,但是每一份文献都是非常独立的,“相比于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经常缺乏数理的或形式化的风格。有时这是因为比较制度分析从形式化中所获不多或一无所获;有时这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复杂的经济组织是以相关的方式而存在的。早熟的形式化可能且有时确实抑制了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不能避开或丧失形式化”(Williamson, 1985: 193)。埃里克·G·菲吕博顿(Eirik G. Fumbotn, 1994)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一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半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马修斯(1986)同样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经验研究已经被带到了过度的程度,毫无疑问经验研究在经济学的其它领域也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一领域理论模型可能或可能不比其它领域更加困难,但是在这一个领域的经验研究却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因为经济制度是复杂的,他们并不轻易地有助于数量上的度量”(Matthews, 1986: 917)。

统一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从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看,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古典主义制度经济学或简称为新古典制度学派。

公共选择(或立宪经济学抑或立宪制度选择)

公共选择学派——被诺斯看成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也是处理制度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派别,它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表述被称为立宪经济学。立宪经济学起源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他们如何处理制度问题?

早在1987年,布坎南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立宪经济学”辞条时曾经指出,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立宪经济学是“通过对照与比较,来说明可供选择的法律-组织-制度规则组合的运行属性,而这些规则制约着经济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和活动,限定了他们进行一般选择的范围。因此,与传统经济学相比,立宪经济学涉及‘更高’层次的研究。它必须把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成果与许多不那么复杂的分支学科相结合。……可供选择的规则组合必须以某种类似的方式进行评估,并在特定的系统结构内依次列出政策选择,而‘效率’标准中的认识论内容则变得更加突出。”借用布坎南的语言,立宪经济学探讨的是“制约因素的选择,而不是制约因素内的选择”(Buchanan, 1987)。很显然,在立宪经济学看来,制约因素的选择就是制度,选择是在制度因素制约下的选择。因此,布坎南认为,立宪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学术领域,它可以归纳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名下,它包括“(1)公共选择理论——立宪经济学源出于此;(2)产权经济学;(3)法律与经济学或法的经济学分析;(4)管制政治经济学;(5)新制度经济学;(6)新经济史。如果下一个扩张的定义,立宪经济学可以与范围更广的新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并可以囊括上述所有的学科,因为每一个学科都关心经济和政治行为者进行选择的法律-政治制约条件”(Buchanan, 1987)。在布坎南的心目中,新制度经济学是立宪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相反。

所谓“更高层次”,就是人们的行为可以分为立宪性层次(Constitutional Level)与执行性层次(Operational Level)^①。所谓立宪性层次与执行性层次,是指对于制度进行选择的层次与在既定制度下进行选择的层次。布坎南强调,执行性层次可以用成本-收益的语言进行讨论,而立宪性的层次无法用成本-收益的语言进行分析,因而,在布坎南看来,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是执行性层次的问题,立宪经济学则讨论立宪层次的问题。问题是,布坎南如何讨论立宪层次的规则选择?

布坎南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在他看来,处于选择规则位置上的个人与在既定规则内选择的个人,面临的情形是不同的。在执行层次,由于个人的利益是可辨认的,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具体计算和权衡来取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在立宪层次,由于个人的利益是不能清楚辨认的,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具体计算上的,而只是抱有效用最大化动机的不同个人彼此间达成了协议。在选择规则的层次上,个人并不能清楚地辨认自己的成本-收益,从而也不可能对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作出规定。

^① 根据唐寿宁的研究,布坎南的这一术语还存在着其它的划分方式,具体包括:“立宪选择与后立宪的或时期中的选择”(1987)、“立宪的决策制定与日常的决策制定”(1987)、“对约束的选择与约束内的选择”(1989)、“经济的结构与该经济在这一结构内的运行”(1991)、“博弈的规则与规则内的博弈”(1991)。唐寿宁(1997):《立宪经济学范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布坎南认为,效用最大化的情形可以进行分解并拓展为净财富最大化(Buchanan, 1989),这样就可以为机会成本的讨论扩张空间。布坎南认为,机会成本从来都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它是一个主观主义的概念,是不能预设的^①,这样就可以将交换与选择分离开来,因此,通向规则选择的路径是一个过程或者说“一致同意”。“一致同意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神圣,而在于它提供了判断规则的唯一标准”(Buchanan, 1987: 228)。

因此,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实际上是“无目的的经济”(the purposeless economy)。因为在一个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经济中,实际上不可能提出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功能,也没有意图。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把经济定义为一个结构、一组约束规则,在这一规则内个人寻求获得他们各自确定的目的,这一定义使政治规范的技术倾向变得自相矛盾”(Buchanan, 1991, 27—28)。最终,布坎南认为,国家既不全知全能,也不仁慈,只是一套政策、法律结构,作为任何人类互动的功能性秩序的基本要素。对国家或集体干预的倾向性程度直接取决于关于“什么是经济”的理解。如果把经济理解为一台机器、一个机制或手段,被组织起来用以获取明确规定的目的,那么,就或多或少导致倾向于国家或集体对互动过程的干预(Buchanan, 1991, 35—36)。布坎南认为,立宪经济学不是向政客提供建议,而是对延续的制度秩序给予规范化的分析(Buchanan, 1987)。

很显然,立宪经济学根本就不像诺斯所说的那样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布坎南的理解与诺斯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根据唐寿宁(1998)的分析,布坎南实际上是为了把制度秩序解释成一个机制性的知识增长过程,而不是依赖于个人在选择之前按照个人效用或偏好排序的事前知识,它与哈耶克是殊途同归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制度分析:从自发秩序到市场秩序化过程

对奥地利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界并不陌生。作为发源于德国、奥地利的主观主义经济学,它不仅推动了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而且因为主观主义方法论而成为现代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理论策源地。这一学派的经济思想经常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 von Bohm-Bawerk)、维塞尔(F. von Wieser)、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F·哈耶克(Hayek)等人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源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门格尔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已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在四个发展阶段上,几乎每一代代表人物都处理制度问题。

门格尔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他对制度问题的处理是在他的社会经济观阐述中提出来的,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制度是一个为了主观主义分析经济问题的预设。门格尔认为,制度起源于无数个人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自私利益的互动。门格尔相信,康芒斯的集体行为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超级的建构,但是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制度理论。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分散化的经济环境下能够引导经济行

^① 为什么成本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布坎南认为,成本具有六个属性:(1)成本必定唯一地由作出决策的人承担,不可能转移或强加给别人;(2)成本是主观的,它仅存在于决策制定者或选择者的心中;(3)成本是以预期为基础的,它是一个前瞻性的或事前的概念;(4)成本决不会因为选择被作出而体现出来,被放弃的选择本身决不能被享用;(5)成本无法被选择者之外的人所计量,因为无法直接观察主观的心理感受;(6)成本发生的时间局限在最终决策或选择作出之时(Buchanan, 1987, 149)。

为主体实现帕雷托最优的竞争性均衡,同样,“看不见的手”也可以引导他们创造社会制度,并在竞争性产出不是最优的情况下促进经济人之间的互动。同时,门格尔也以另一种方式来强调制度,由于市场起源于个人经济行为的最大化产出,所以经济学所处理的制度只有一种——市场。一系列其它的制度——如规范、规则等也都是因为有助于最优化地分配资源才创造出来。这些其它的制度是按照有机体的方式发展的。因此,门格尔强调“制度如何服务于公共福利,对于它们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脱离了共同意愿(common will),制度不会出现,不会被直接地建立起来”(Menger, 1883, 147)。很显然,当时的门格尔是为了寻找“人类为满足其实际欲望而展开其预期活动的条件”,而不是“经济行为的实际建议”,因此,到后来他将实际经济活动都看成是知识和时间的活动(Menger, 1892)。

继承门格尔制度分析主张的奥地利学派后继者是哈耶克。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经济理论。哈耶克的制度理论是与他的知识分工和自发秩序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卓越的贡献(汪丁丁, 1996, 1997, 1998; 邓正来, 1997, 1998)。哈耶克对理论捍卫的立场、知识观和秩序分类学等领域都加以厘清,并接通了相关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路径。然而,在哈耶克对秩序的分类探讨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分布式知识、认知和市场网络结构,在其中秩序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网状的结构,这种网状的制度结构是因为预期与行为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信息与预期之间的互动可能需要一种秩序进行维护。

后来,在哈耶克论述知识、信息和竞争的含义的过程中,他开始寻找在秩序中的网络结构。在哈耶克看来,网络是一种结构,它由一系列的单元(单位)或者节点和关系或者一个单元的内部连接所构成。这些关联性的关系可以根据它们的不同形式(比如距离、对称性、不对称性、可传递性、不可传递性、单一性和复杂性等)和它们的内容(比如交易、通信、思想、情操、权力和血缘关系)来识别。

在哈耶克的理论中,网络结构和秩序是制度的同义词,或者说秩序是信息与预期互动的结果,并在网络结构的扩展中形成制度化的知识。从 50 年代关于秩序的心理基础与后来陆续在《自由的宪章》(1960)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自由, 1973, 以及第三卷: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1979)等一系列的鸿篇巨制以及特别晚年的《致命的自负》(1988)中,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和文化演化的思想是联系起来的,实际上 50 年代的心理学研究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早期的铺垫。因此,从整体上把握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或者说自发秩序理论,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他的演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这或许就是第四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在引入学习和演化的过程中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心智理论作为基础的原因(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1985; Richard N. Langlois, 1986, 1995),他们基本上不剔除哈耶克理论中的“个人计划”等一些概念。同时,这可能也是公共选择主义者维克多·万伯格(Viktor Vanberg)说哈耶克自发秩序中存在着理性的建构主义与理性演化主义逻辑紧张的原因。

第三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如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科茨纳(Israel M. Kirzner)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其中,如斯巴德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意志论者。就如斯巴德而言,

我们明确拒绝下述的观点:人们需要有个监护人帮助他们防备自己,并指手画脚地告诉他们什么好,什么不好。……我们捍卫的是人人都应该有的,任何人不得剥夺的基本权利,是保护个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犯的权利,不管这种侵犯是来自个人

还是来自所谓的国家(Rothbard, 1971)。

如斯巴德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理论和商业循环的专家。在对美国大危机的研究中,他干脆将一切经济恐慌、经济危机和经济秩序的混乱都明确地归罪于政府。在他的《人、经济与国家》(1962)中,他认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人类行为,保持人类行为的最优状态,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干预,即使是针对社会秩序的紊乱(如大萧条),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市场是人类社会演化出来的最好的制度(1993, 765—890)。因此,如斯巴德被称为绝对自由意志运动的创始人(勒帕日, 1977)。

科茨纳的理论是企业家理论和市场过程理论,而且传承了奥地利经济学新一轮的思想旅程。在科茨纳的理论中,我们可能看不到制度这样的术语,而是市场的秩序化过程(market process)。他主张用“秩序化过程”(process)代替均衡概念。他认为,经济环境是不确定性的,企业家具有市场警觉、知识的敏锐性,能够探知发现市场的路径,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and 知识,企业家发现的机会和实现的利润都是符合道德的,任何人为的干预和制度设计都是危险的(Kirzner, 1973, 1979, 1982, 1984, 1985, 1992)^①。“强调市场交易所形成的秩序化倾向而不是强调由这一秩序化过程所形成的配置方式,划清了与完美合作的乌托邦概念之间的界限”(Kirzner, 1982)。同时,他强调“企业家的警觉不局限在注意已经存在的价格差异,而是远见卓识地利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机会实现瞬间的套利交易”(1982, 4)。竞争是企业家形成和市场秩序化形成的关键,而这一切要求政府放弃干预,“自由进入是市场发现和市场秩序化过程的法律和制度的严肃的先决条件”(1982, 4)。他进而认为,如果效率被认为是给定的,“经济化的过程并不包括迄今为止未被认知和发现的机会”(1984, 4),而经济化和秩序化过程正是在认知机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方法”。在科茨纳看来,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从这种更新的观点看,公共利益严格地依赖于社会制度超越狭隘的短缺问题并使分散、原始、不合作的少量的知识动态化的能力”(1984, 6)。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归纳如下:科茨纳的制度分析观实际上是知识的累积过程,它是在企业家的警觉和套利交易过程累积起来的,而且不断地经济化和市场秩序化。

同样,拉赫曼对市场秩序化过程的研究给予制度的关注。他认为,“从经济学来看,制度理论是竞争理论的社会学的摹本(sociological counterpart)”(Ludwig Lachmann, 1971, 68)。他沿着门格尔和哈耶克的思路强调:

非设计的制度是在立法秩序的空隙中追求个人利益过程渐渐演化的非故意的与和不可预见的结果。即使在这一累积的过程中,沉积不能或不可能被计划,但是,这些空隙已经被计划了。在这种类型的社会,我们可以区别外部的制度——它构建了一个社会的外部结构,如立法秩序——和内部制度,它是市场秩序化过程渐渐演化的结果,并且是自发的个人行为的其它形式(Lachmann, 1971, 81)。

同时,拉赫曼认为,“在我们看来,制度秩序的中心问题是以连贯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差异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是以作为整体的制度秩序的必然永恒的本质,与个别制度的必备的适应性之

① 我之所以将他们这一批人物称为第三代奥地利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 在 70—80 年代初几乎都聚集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和人文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e Studies),团结在科茨纳的周围。在 70 年代他们是科茨纳所主持的“奥地利经济学专题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将每一次讨论的结果编辑成册由麻省 D. C. Heath and Company 以 LexingtonBooks 出版。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他们每一个人都独立或联合编辑了大量的纪念性的论文集,而且在这一过程获得了学术声望。此后,他们的独立专著开始出版,而且引起了奥地利派之外的广泛的注重。

间的差异为转移的”(Ludwig M. Lachmann, 1971)。

显然,拉赫曼的制度分析观似乎是想更加综合地理解自发秩序与理想类型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制度思想中留下了“立法秩序的空隙”,给“计划”一席之地。

奥地利经济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主要是格瑞尔德·奥德瑞斯考(Gerald P. O’Driscoll, Jr.)、马里奥·瑞佐(Mario J. Rizzo)、理查德·朗格(Richard N. Langlois)、安德鲁·萧尔特(Andrew Schotter)以及彼得·勃特克(Peter Boettke)。萧尔特和朗格都分别撰写过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专著。

萧尔特将演化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构造了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在他的模型中,经济行为当事人具有不同战略的选择以达到最大化的收益。他继承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假设,所不同的是他强调所有的博弈都是重复的,“游戏被重复地玩下去,参与者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性的经验规则、规范、传统和制度,并且他们可以传递给每一代的参与者”(Schotter, 1981, 12)。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萧尔特认为,制度和日常惯例与市场的“不完美性”并不直接相关,实际上,它们所提供的是至关重要的信息,特别是为博弈中的参与者提供了关于其它参与者未来战略状态的信息。“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能够接受的一套社会行为的规则,特别是在循环条件下界定社会行为,制度不是自我制定的,就是由部分社会权威制定的”(Andrew Schotter, 1981, 11)。他给社会制度的一个完美的定义是:“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的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同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1981, 11),它符合以下的条件:

1. 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守;
2. 每个成员预期其他人都会遵守;
3. 在其他成员遵守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宁愿遵守这一行为的规律性,如果重复状态是一个合作问题,那么在单一的行为规律性遵从中,就存在着合作均衡;
4. 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行为规律性,某些人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人也将会偏离或权衡与重复博弈相关的行为规律性,那么对所有的行为当事人来说,偏离的战略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萧尔特认为,这种博弈演化分析模型应该走向对经济学的新制度分析(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s),应该将制度、团队生产、等级制、满意程度以及有限理性综合起来。在萧尔特看来,

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信息性设置,当竞争性价格不能为全面分散和协调经济活动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的时候,社会和经济制度为经济系统注入了信息内容。更精确地说,尽管价格传导了关于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因此为经济行为当事人的经济化活动创造了激励,但是,当这些行动不能由价格和因此而创造的激励来协调合作行动的时候,社会制度传导了为这些当事人的预期行动所需要的信息。此外,我们看到,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的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的博弈(a game of institution-assisted perfect recall)”(Schotter, 1981, 109)。

与萧尔特相比,朗格较好地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相当松散的结合,在某些方面是静态的(产权、契约),在某些方面是动态的(经济史、制度变迁),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的扩展(1989)。他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扩展应该是将制度看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有一种信息支持的功能。在本质上,它

们是人际间的合作知识的宝库, 同样, 他们服务于立即约束经济行为当事人的问题状态的维度并为当事人设置了认知的范围”(Langlois, 1986, 237)。因此, 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他也使用这样的术语)应该融合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熊彼特关于个人资本主义的理论、现代奥地利主义者克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哈耶克的知识论、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的产权和企业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理论以及西蒙的组织行为主义理论^①。

在这一综合的分析框架下, 郎格和罗伯特森(Richard N. Langlois & Paul L. Robertson, 1995)出版了《企业、市场与经济变迁: 企业制度的动态化理论》。他认为, 制度可以按照行为的重复方式和结构进行定义, 关于行为的重复方式的制度是习惯、传统和日常惯例, 这些制度都具有一定的生产性, 它们内植于重复的行为方式之中, 它们是默认的知识 and 实际技能的知识集合, 并对结构的制度产生知识支持功能。如何定义结构的制度? 他们认为, 既然具有知识的支持, 制度可以划分为内生的、外生的、半内生的和半外生的等几种类型。适应于社会结构、技术变化和行为习惯的制度, 都是内生的制度, 这些制度包括习惯、传统和市场等; 外生的制度就是对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出刺激反应的调整而形成的制度, 诸如商业制度、企业制度; 但是如果一些制度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结构范围内, 或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组织(也是制度类型)之中, 那么内植于结构的制度就有半内生和半外生两个属性, 产权制度、国家制度以及立法制度等都具有半内生性, 而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 税收制度、交通管理制度以及不同的产业政策等就是半外生的制度(Langlois, 1994)。因此, 朗格强调那些由默认的知识所支持的制度就是内生的制度, 相反由编码化的知识支持的制度就是外生的制度。他主张综合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该致力于发展一个学习理论, 将交易费用的概念动态化, 以便解释一个具有所有的信息支持和内植于制度中的能力。

演化经济学抑或演化制度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传统中——就如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中一样, 经济学家经常有认祖归宗的倾向。演化经济学作为制度分析的一个思想派别, 它经常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马歇尔^②、熊彼特、马克思、阿尔钦^③ 等人。实际上, 真正导入制度分析的演化经济学家是尼尔森和温特(Richard R. Nelson & Sidney G. Winter, 1982)、多西(Giovanni Dosi, 1995, 1996)、马斯姆·埃格

① 朗格的这一综合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述。我通过互联网对他的综合思想提出了讨论, 问他为什么不包含诺斯的理论? 他认为诺斯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理论, 他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将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巴塞尔以及奥尔森等人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我曾经为诺斯辩护, 争辩说在诺斯体系中存在着搭便车理论、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和长期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他认为, 这些理论不是诺斯的, 前三个理论是奥尔森的, 后面的理论与认知科学与演化理论有关, 诺斯也仅是运用。

② 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思想经常既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必经之路, 也经常被看成是演经经济学的起点。马歇尔确实说过, “经济演化是渐进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 而不是经济动力学。”

③ 阿蒙·A·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在1950年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 这篇文献被视为演化思想的正式的运用。阿尔钦(1950)的这篇经典论文实际上是反设提出演化问题的: 企业家实际上是不是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 如果是, 在定价政策和特殊的税收对产出与价格的影响方面, 就必须有所体现。所以可以通过考察税收的影响来检验企业家是不是这样。但是, 这样研究太难, 可以另选他法, 可以询问企业家, 真正支配他们动机的究竟是什么。可是直接询问, 如同税收的影响一样, 很困难而且不准确。在这篇论文中, 阿尔钦主张研究“生存过程(survival process), 价格机制被类比为择优汰劣的达尔文机制(Darwinian mechanism)。”“优”是按照创新者比竞争者实现的更大的利润能力来判定的。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做到利润最大化, 办不到这一点, 他们就要破产, 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利润最大化者。这一观点, 可以帮助我们证明一般的利润最大化假设, 而不必讨论每一个反例。

耶蒂 (Massimo Egidi, 1995, 1996, 1998) 等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阵营^①。他们所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技术变迁, 制度变迁不过是他们研究的副产品。

尼尔森和温特在 1982 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分析了企业制度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他们把制度定义为日常惯例, 企业就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制度。他们认为, 在一个企业内部, “‘决策规则’ 非常接近于生产‘技术’的概念”(1982, 14)”, “所有规律性的和可以预言的企业行为方式都是‘日常惯例’”(1982, 14)。他们认为,

我们使用这一名词来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 从明确规定的生产物品的技术日常惯例, 经由雇佣和解雇、订购新存货或不断增加具有高度需求的各种物品的生产产量这些程序, 一直到关于投资、研究与开发 (R & D) 或广告政策以及关于生产的多元化和海外投资的商业战略。在我们的演化理论中, 这些日常惯例起到了基因在生物演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它们是有机体的持久不变的特征, 并决定了它的可能性的行为(虽然实际行为也是由环境来决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具有遗传性, 明天的有机体是从今天的有机体衍生出来的(比如, 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工厂), 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 在另一种意义上, 它们是选择性的, 具有恰当的日常惯例的有机体可能比其它的有机体做得更好, 同时, 如果是如此, 在群体(产业)中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就会随着时间而增强 (Nelson and Winter, 1982, 14)。

尼尔森和温特认为, 日常惯例是演化的, 它的演化构成了企业制度的扩展过程。问题是日常惯例如何演化? 日常惯例作为企业内生的制度具有知识属性。他们认为, 日常惯例的知识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常惯例是组织的记忆。它可以回答“知识存在于何处”的问题, 就存在于一个组织的记忆之中。这里的组织具有制度的含义, 换句话说, 日常惯例是制度的核心。
2. 日常惯例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 它可以导致有效的合作, 将冲突和摩擦减到最小程度。
3. 日常惯例具有目标导向的能力, 能够成为一个组织的目标, 具有控制、复制、收缩和模仿机制, 能够对成功的制度进行自发地复制和传递。

他们认为就像个人拥有技巧一样, 组织所拥有的日常惯例是一个组织的制度化技巧, 它是一种行为的启发, 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 并在演化过程中寻求到最优的日常惯例 (Nelson & Winter, 1982, 97-136)。

将制度作为日常惯例的研究, 尼尔森和温特的这部著作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在后来的文献中, 日常惯例被看成了“重复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一个文化的演化过程。1995 年 8 月, 奥地利国际复杂系统研究中心和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举行了一次这一领域学者的国际讨论会, 在这次讨论会上, 他们表达了一个宣言性的对话文件。他们认为, 日常惯例可以按照下列的方式进行定义:

1. 在所有的行为方式中, 不同的个人为了发挥他们的前瞻性, 必须调动他们自己的记忆;
2. 触发行动的共同的语言, 在制度的构建中特别形成共同的形式化功效;

^① 自命为演化经济学名下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非常混杂的一个团体, 这些经济学家聚集在奥地利的卢森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中心 (IIASA)、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研究所、意大利的 Trento 大学的经济行为模拟与实验研究所、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依阿华大学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研究中心等等。他们直接的思想来源是社会生物学, 将社会生物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制度分析中时, 他们的经济学思想的来源是旧制度经济学。

3. 通过组织的实践——比如档案、人员的流动、工作规范的保持或通过建立组织的结构,形成了结构化的知识(architectural knowledge);

4. 全面的共同的语言规范,比如口语表达方式或者誓约等等。

这一定义不仅是知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人类运用认知能力对重复性行为认知的结果。在考瑞特和多西(Benjamin Coriat & Giovanni Dosi, 1995)联合发表的论文中,他们将制度定义为一个演化过程,具体包括:

1. 正式的组织(从企业、技术实体、贸易组织、大学到所有的国家机构);
2. 能够被社会成员所共同理解的行为方式(日常惯例、社会传统和伦理规范);
3. 消极的规范和约束(道德戒律和各种正式的立法)。

在这一制度的谱系之中,制度的作用是什么?考瑞特和多西认为,制度的作用主要是(1)对环境状态的可变性进行参数化,比如:市场的比较成本、组织的各种形式和等级化形式的治理成本比较、环境演化的趋势、技术机会以及技术潜能获得的条件等;(2)为经济行为当事人的行为菜单提供约束,因为制度是内植于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之中的。同时,他们认为,“制度不仅仅是在给定环境的条件下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参数化和约束,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当事人的‘世界观’、互动性的网络、行为方式,并最终形成当事人身份的恰当的等同性”(Benjamin Coriat & Giovanni Dosi, 1995, 5)。他们称威廉姆森和诺斯是制度管制主义者(Institutional regulationist)

埃格耶蒂虽然同意多西等人的制度分析,但是,他尤其强调日常惯例——作为制度或者是组织的惯例化行为既然具有知识论的基础,那么日常惯例就是“规则的集合”(set of rules, Egidi, 1996),因为经济行为当事人总是处于“似乎”的困境(‘as if’ dilemma)之中,日常惯例作为一个规则的集合,从而就使得逆向选择与有道德的选择同时存在于市场上(Egidi, 1995)。他认为,制度不能进行先入为主的定义,它们不是“人为设计”(显然是针对诺斯的),而是市场演化过程的自我修复(Egidi, 1998)。为什么当事人会处于“似乎”困境之中?他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知识分工使得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制度作为自发演化的规则集合要求人们形成共同的合作的知识(Egidi, 1998)。因此,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应该将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哈耶克的知识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与科斯、威廉姆森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便为企业和市场制度的解释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

最近几年来,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正在被演化博弈分析所替代。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多半是微观经济学家,并且娴熟博弈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卫·克雷普斯(David Kreps)、宾姆尔(Ken Binmore)、拉瑞·萨穆尔森(Larry Samuelson)、H·派顿·扬(H. Peyton Young)、萨穆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尔伯特·金蒂斯(Hebert Gintis)等人。

他们理论的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习俗(convention)、传统或者是行为规范,而这些制度是在一个演化稳定的博弈结构中进行的。在整个演化博弈的框架下,应该更加强调,“社会的和物理的技术分析模型具有一定的特征,但是,对于不同的理由而言——比如智力能力、专业化、以及环境上的差别,人们对它们的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在行为(包括生产)的特殊领域,非专业人士经常依赖于分析模型,这一模型更类似于强制性的学习而不是复杂的认知(Kreps, 1998)”。他们正在致力于发展一个由认知能力和学习模型支持的制度演化理论。他们所使用的共同的术语是“共同知识”以及规范、价值和偏好以及学习能力的演化,这些都是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宾姆尔认为,“行为理性是传统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行

为理性就是基于习俗而形成的行为互动和互惠性；共同知识来源于重复的囚犯困境(Bowles, S. & Herbert Gintis, 1995)；扬则认为，制度演化过程是“个人战略”与“社会互动”的结果(Young, 1997)，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的知识。

这些人的理论的出现正处于制度经济理论的前沿，并正在产生非凡的影响。他们直接的理论先驱是阿塞尔罗德(R. Axelrod)、奥地利学派的演化博弈论者萧尔特(Andrew Schotter)，但是，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可预言的行为模式、行为的互惠性(reciprocity，或者称为道德的对称性)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历史经济学抑或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经济学，有时候又被称为历史计量学^①(cliometrics)或新数量经济史(New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90年代以来，干脆又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史(New institutionalism economic history, Nye, 1997)。在国际经济学界，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术领域。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到历史计量学，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域的许多代表人物都使用制度的分析方法来描述历史。这种历史观，与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l)、汤因比和柯林伍德，德国的历史学派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既不同，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在这一领域扎根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历史学家。

历史计量学，这一名称是由美国数理经济学家斯坦利·瑞德尔(Stanley Reiter)1960年首创，据说，主要取意于缪斯史官克里奥(Clio)与计量经济学的后缀“metrics”叠加而成的。据说采用这一方法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出于对当时美国经济学界主流思潮的一种响应和“反动”。响应的是美国经济学界在经历了“凯恩斯革命”以后，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理解和解释当前的经济政策，数理和计量经济学开始凸显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年轻的经济学家普遍使用数学、统计学来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反动”的是，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普遍不关心历史研究，“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省略了历史……而专注于持续25年以上的时间序列的事实整理”(Donald N. McCloskey, 1976)。当时历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费里德曼、舒尔茨、里昂惕夫等人都竭力地呼吁和鼓励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关心历史问题的研究，以便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虽然这些经济学家身体力行，自己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但是所收到的效果甚微^②。

实际上，数量经济史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流派，无论是在时间的起源上，还是在学术取向上

① 根据计量历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的解释，cliometrics 由于直接来自希腊文字，可以被简单地翻成数量史，而不是数量和理论经济史。因为数量政治和社会史，在一定程度上与数量经济史是共同的。所有的数量史都是对社会科学的响应，并期望通过使用数量技术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相匹敌。但是，计量经济史在起源上和社会成果上都是直接来自或服务于经济学的。

② 有两个非常令人深刻的印象：一是，从1925—1974年，主流的经济学杂志几乎不发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二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每5年才聚会一次，讨论自己的领域，而且参与的大学寥寥无几，只有芝加哥(Chicago)、普渡(Purdue)、威斯康辛(Wisconsin)、爱荷华(Iowa)、伊利诺伊(Illinois)、印地安那(Indiana)、迈阿密(Miami)、亚利桑那(Arizona)、西北(Northwestern)等大学，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是普渡大学。到1983年，使用计量和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们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成立了历史计量学会(Cliometrics Society)。

都存在着尖锐的争议^①。在这里,为了描述制度分析观的需要,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经济史研究的“历史经济学”(Historical Economics),而不关心历史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历史经济学已经进行了三代人的历程。

最早关于历史经济学的研究是与经济增长原因的探寻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现和搜寻增长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库茨涅斯(Simon Kuznets)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根据麦克洛斯基的说法,在美国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主流的经济思想基本上困惑于经济学本体和方法论革命,“他们认为,历史是非经验的科学,隐含着错误的、陈旧的和不可信的事实会从另一个结构中闯入经济学……那个时代的美国经济史既没有好的经济学,也没有好的历史,美国制度主义者仅仅是德国历史学派暗淡的回声”。但是,作为第一代历史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库茨涅兹和格申克隆,他们首先将数学、统计学融进了经济学,并在各自任教的大学广授门生,以便致力于一个新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从严格的意义上看,他们当时的研究尚且不能称之为历史经济学。库茨涅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统计学带入了经济学,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在国民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对所分析国家的数据进行历史的追溯,从而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特征。库茨涅兹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明显包含了对制度因素的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运用,就必须作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实现人类正确利用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革新。在库茨涅兹看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形成的结构变换速度是总的经济增长速率的“革命性的加速度”。作为经济增长或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家,库茨涅兹对制度的重视主要是深受米契尔的影响(Kuznetz, 1971)。虽然库茨涅兹没有一个制度或制度变迁的理论,但是,他对制度的强调对道格拉斯·诺斯却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Douglass C. North, 1995)。

作为历史经济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历史学的“巴门尼德连续统”(Parmenides' continuity)的批评并将其运用到对产业革命的解释之中。

“巴门尼德连续统”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巴门尼德和他的学生泽诺(Zeno)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连续的,则变化是不可能的。后来被转意为,任何事情挤得太紧就不能动弹了。对于历史变迁的意义在于:如果人性没有“实际”变化,历史就成为令人厌倦的宣言,事情变化越多,它们就越保持相同。格申克隆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

① 美国经济协会1997年年会特别安排了一个讨论计量历史学的专题分会。几乎所有热衷于计量历史学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辩论。根据Claudia Goldin(1997)和诺斯的看法,计量历史学产生于1957—1958年,主要归功于Alfred Conrad和John Meyer(1957, 1958)的两篇经典论文。Claudia Goldin将这一学派的发展划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65—1975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传统的历史经典,他们执教于第二流大学的历史系课堂上,其研究主题主要是航海法在激发美国独立革命的作用、铁路和运输网络的经济影响、奴隶的获利性、南北战争之后南部经济落后的起源和状况、大衰退的原因、杰克逊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关税的后果等。计量经济史的第一阶段获得许多新颖的和创新的成果,吸引了许多热心的追随者;第二阶段为1975—1985年,这一阶段放弃了传统的历史经典,开始使用反设事实的研究方法对铁路、内战的起源和关税与幼稚工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98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追溯过去理解现代”,“许多普通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史学家”,关注的主题是生产率的下降、不平等的起源、经济的集中化、社会改革计划的起因、女性劳动力、种族不平等、移民、人口的老年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以及政府的扩张等。特别值得指出,这一阶段的研究指出“制度是历时生存的,个人和制度自身将他们从过去带到了当代”。Claudia Goldin的论文虽然给制度历史分析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主要体现的是他个人的研究经历,特别是对劳动力中女性构成的变化研究,更没有提及“历史经济学”这一说法。参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7, Vol. 87, No. 2, 396—414。

它排除了历史的意义。连续性和间断性都是简述历史演化过程的工具,强调“自然无跳跃”(马歇尔,1920)和历史发展的离散规律,对于经济学而言,数学意义上的连续性与经济演化过程的连续性是有区别的,社会科学应该研究变迁和连续性,“不该为那些必须在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找到其游戏和战斗场所的革命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所干扰。”因此,格申克隆强调,“连续性和间断性是历史学家制作的工具,而不是历史事件中所固有的和内涵的东西……在所有的进程中,正是历史学家的有序化之手,创造了连续性或间断性。”

历史经济学的第二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恩格尔曼(J. L. Engerman)、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保罗·大卫(Paul David)、彼得·特明(Peter Temin)、乔尔·莫克(Joel Mokyr)等人。

罗伯特·福格尔几乎总是与“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或“新数量经济史”(New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联系在一起。福格尔的历史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统计推理的叠加,他基本上是通过“假设”(as-if)提出反设事实问题,然后进行验证。在福格尔看来,历史经济学就是反设事实的历史-经济经验研究。

除了反设事实之外,福格尔还使用“创造性自我质疑”(creative self-doubt)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在他看来,收集自己所需要的素材并以经济学家的态度浸透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对于历史经济学来说尤为重要。可以说,他的一系列著作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比如1964年他对美国铁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出版了《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整个260页的篇幅,只有一页纸的结论,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分析美国19世纪铁路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而推翻了铁路是美国经济增长先行部门的结论。1974年,他与恩格尔曼(Engerman, Stanley L.)出版了两卷本的《黑暗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学》。他们的结论是,南方的奴隶主就如同资本家,利用市场机制作为鞭子驱使他们的奴隶,也只有使用南北战争这样的非经济手段才可能破坏奴隶制经济制度,否则,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制度并没有根本被淘汰的历史原因。这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史研究方面最有争议的著作,它推翻了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盈利生产方式的正统观念,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只是南北战争这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导致了它的解体。保罗·大卫和彼得·特明在书评中指出,在对待经济学的一些确凿的断言上,“处理这种诱惑或强制的固定经济制度的经济理论确实是不存在的”,福格尔的著作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开端。麦克洛斯基的评价显得格外明确,“不能指望钉牢在当前的经济问题上的经济学家会提出为什么劳动和资本市场制度会变迁这类问题。”

到了70年代,历史经济学明确地关注社会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主要归功于道格拉斯·诺斯及其学生的贡献。1971年,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和诺斯出版了《制度变迁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此后又与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的观点》。诺斯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重要的著作。以诺斯为代表的历史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广大的新古典制度历史经济学派(Field, A. J., 1981)。

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Donald N. McCloskey)主要研究英国经济史。他认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对产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麦克洛斯基历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制度在解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的整个理论前提是价格理论,但是,在每一个时期的分析中都体现出对产权结构以及分类、信息与交易成本的估算。1976年,他发表了在历史经济学中奠定威望的文献《历史拥有有益的经济学吗》,在这篇文章中,他指责当代的

经济学家们忽视对经济史的研究, 严肃指出, 认识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代的经济现象。“除非他是一个十项全能运动员, 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没有历史之腿向前跳跃, 他对当前的经济问题就会形成狭隘的眼光, 浅薄的经济思想, 对经济数据的力度和脆弱性缺乏恰当的评价, 缺乏运用经济学驾驭重大问题的能力。”(McCloskey, 1976)

第二代历史经济学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直接延伸, 大大拓展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的叙事风格, 将个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融入了历史进程, 并且使用历史进程予以验证。“对于经济想象, 限定和扩展经济学技艺的限制因素而言, 历史是一个促进因素……经济学家可以从历史中得知整个经济大厦起源于何处, 他的邻居是怎样建造他们的经济大厦的, 为什么在此处是一个建造方式, 而在另一处是以另一种方式”(McCloskey, 1976)。但是, 与此同时, 他们对方法论上的争论却不屑一顾。就如同阿西顿(T. S. Ashton, 1946)所说, “至于关于演绎法还是归纳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的全部争论, 当然是非常幼稚的: 它就好像我们在争论是用右脚行走, 还是用左脚跳跃行走。有双脚的健康的人都知道, 如果在行走时, 同时使用双脚, 他们可能走得更快。”

历史经济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主要是约翰·奈(John Nye)和艾乌纳·格瑞夫(Avner Greif), 同时还包括加里·李贝开普(Gary D. Libecap)、李·阿尔斯顿(Lee J. Alston)、约瑟夫·弗瑞尔(Joseph P. Ferrie)等人。

约翰·道巴克(John N. Drobak)和约翰·奈 1997 年共同主编出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①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奈对新制度经济学给予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术语”, 尽管他们与正统的理论和异端的理论有所区别, 关心的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分析的问题, 但基本上是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运用和扩散, 并且相信新古典价格理论是理解世界的有力工具。他认为, 制度演化和市场力量之间的互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 他们缺乏数学化的形式化构建, 近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放弃或至少是放松了关于新古典理性的假设(1997, xv-xvi)。根据他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标志的下一步研究领域应该是:

1. 交易成本和产权;
2.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
3. 数量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理论为背景);
4. 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

这些研究领域是与简单化的案例研究、书面契约和立法规则的分析、简单化的国家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相区别的。同时, 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学下一步并不需要一个形式化的理论。

这一研究议程在他提交给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第一届年会的论文(1997)中表达得更加明确。他不仅重新命名上述的研究议程——新制度经济史分析, 而且认为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应该向第一代经济学家——特别是库茨涅兹和格申克隆学习, 同时他对不需要形式化的理论风格提出了解释。“经济学不是物理学, 同时科学精神在无休止地精雕细琢的一般模型中也不起作用, 而且不一定适合于任何可能的参数集合或初始性条件。我们忘记了两件事情: 第

^① 约翰·道巴克和约翰·奈 1995 年 3 月曾经为了纪念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召开了一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国际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一些经济史学家, 他们对诺斯的贡献进行了评价, 并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下一阶段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议程。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eds., 1997, *The Frontier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Calif., Academic Press.

一,在一定程度上,预言是不可能的,解释和启蒙仍然是值得做的目标;第二,即使物理学家们确实在精心建构模型,他们也是从精心的实验工作和经验观察中所得知的根本认知来创造数理模型的”(Nye, 1997, 8)。因此,不仅长期的历史经济演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是一个不能脱离大范围、交叉社会科学的必然的研究主题。

与奈相比,格瑞夫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包袱,但是,格瑞夫近几年来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特别是与现代演化博弈理论家们(大卫·克瑞普斯、威尔逊和宾姆尔等人)经常并列在一起。

格瑞夫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史,具体来说就是欧洲商业革命之前——11—12世纪地中海的经济史。他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在研究制度之前不能给制度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自发演化的产物。他认为,在处理制度之前,首先必须处理组织。通过比较11—12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最大的贸易集团——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之间文化信仰的差异,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组织——它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以及道德强制制度——是伴随着它的社会建构、信息传递和协调机制的,并且对长期的制度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989, 1993, 1994)。

在1994年以前的这些文献中,格瑞夫为什么要研究11—1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看来,11世纪的马格里布是穆斯林世界一个成部分,12世纪的热那亚是拉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两个贸易集团的研究表明,文化信仰是导致两个不同贸易集团的主要因素,并在他们之间的互动中被构造成为制度,他认为过去的文化信仰为博弈提供了焦点(the focal point)和合作预期,因此,影响了均衡的选择和社会的强制性制度。

格瑞夫认为,从传统的文化信仰的演化过程看,组织的导入反映了知识存量的增长,并导致了有意识的追求或者是无意识的产出。这一研究在他与米尔格罗姆、温加斯特(Avner Greif, Paul Milgrom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4)对中世纪商业革命的行会(merchant guild)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这篇文章证实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行业起源于具有共同知识的协调、诚信和契约的强制。一个重要的延伸是,作为强制契约和产权并提供公共物品制度的国家引起了一个困境:具有充分的力量做这些事情的国家也具有权力抑制保护或强制征收私人财富,并削弱市场经济的基础(1994, 746)。通过检验中世纪欧洲部分城市的行会兴起,他们认为,行会之所以作为一个制度存在而且普遍存在于许多城市,是因为国家困境的存在。行会因为具有文化信仰的依托,所以能够广泛地在不同的商人集团之间建立信息名誉机制,并对行会成员产生诚信和道德强制。在多方名誉机制形成的过程中,使长距离的贸易成为可能,并且形成了分散化的信息交流网络,最终才是产权的形成。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之后,格瑞夫开始对他自己的理论进行总结,为了区别于其它人的新制度经济学,他将这一领域称为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他认为,通过经济史研究经济制度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思想派别:(1)新古典分析,主要是第二代计量经济学家,他们主要是使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来分析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是产业革命,科斯、威廉姆森是这一派的代表;(2)新制度经济史,这一派别的理论认为受三个归纳性的断言支配。第一,制度是通过国家来定义和强制的——产权、规则和管制——并通过它们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决定了经济绩效;第二,历时制度变迁的经济含义被归结为技术变迁,人口增长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其它要素供给潜力的增加,因此,经济产出依赖于不同的制度变迁,它的一个更深刻的应用是专业化导致了发达经济的交易成本的上升;第三,一旦制度是通过政治过程来决定的,制度通常就是无效率的,并且会受到契约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的

影响,因此,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格瑞夫认为,这一派别的代表就是戴维斯、诺斯。实际上,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还有李贝开普、阿尔斯顿、弗瑞尔以及奈等人。

格瑞夫所指称的历史制度分析具有什么特征?虽然格瑞夫在自己的文献中没有给予确切地表述,但是从他所研究的问题可以作出归纳。显然,格瑞夫不同意新制度经济史的分析,他认为,“这一分析(新制度经济史)在阐述制度与经济产出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上是失败的”。根据我们都熟悉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他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解释,格瑞夫认为,什么制度会产生和平的自我强制?贸易的扩张仅仅是和平和要素禀赋的一种功能?制度为什么会影响贸易的时间、地点和贸易广度?为什么欧洲的制度创新会不同于其它发达国家,仅是对贸易增长的响应?对这些问题诺斯的理论都不能提供前后一致的解释。从这一过程看,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它是一种方法论,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概念,格瑞夫称制度为“具有自我强制的非技术性的行为约束”,它直接来自博弈论。在他的理论模型中,两个主要的相互影响的制度性的构成因素是预期和组织。很显然,预期影响了行为,一个博弈参与者关于其它参与者行为的预期是非技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是每一个博弈的参与者都必须面对的。组织也是非技术性的约束,它通过引入新的参与者影响博弈结构中的信息交流、行为以及各自的收益权衡。

第二,这一研究基本上是均衡分析,但是它超越了博弈论中的经验均衡研究,它的目的是经验地解释制度选择过程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它认为制度选择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耗时的历时态过程(ergodic process)。

第三,它特别强调国家的制度基础。这在格瑞夫(1994, 1995, 1996, 1997)的一系列关于热那亚、马格里布的研究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初始的文化信仰对于组织的演化和国家的出现是非常关键的内生变量。热那亚是拉丁世界的一分子,马格里布是穆斯林世界的一分子,然而初始性的文化信仰却最终导致了热那亚成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高度分权化的社会,并且发展出契约、长距离的贸易、行会、产权;相反,由于穆斯林世界的集体主义,只认可组织内部的通信、道德和诚信,最终成为集权主义社会,出现了集权主义国家。

第四,由于制度具有文化信仰的基础,制度变迁过程就是知识增长过程,它体现出来的过程,首先是斯密式的经济增长,然而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应用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

很显然,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正在修正诺斯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过程分析的结论。一个戏剧性的事实是格瑞夫理论的出现,已经促使诺斯对他的理论进行反思了(North, 1995, 1996, 1997)。

归纳与总结:可能的综合

在本文中,我已经给出了在经济学中现存制度分析的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派别,不同的制度分析派别之间的差异,有的存在着天壤之别,有的仅存在细微的区别。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同派别之间的彼此鄙视和相互排除非常令人瞩目;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即使在被人们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科斯、威廉姆森、诺斯之间也是不一致的,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的愿望不是为了表

述理论,而是试图阐述他们迫切的综合倾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制度经济学已经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包括其它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且已经出现了某些综合的取向。在新制度经济史中,这种倾向非常明显,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了新古典理论体系,制度源于个人的最优化决策,随着个人面对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贯穿于全书的是一种效率观点:历史变迁是从一种有效的制度走向另一种有效的制度的过渡。相对价格的变化为建设更加有效率的制度提供了动力。他们并非完全无视无效率的制度形式。对无效率制度,他们做出了两种解释。其一是“搭便车”,由此产生的无效率的制度与新古典方法是不相矛盾的;第二种解释以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不同的力量对比为基础,他们特别强调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君王也许可以通过出售排他性的垄断权利获得短期利益……因为他可以通过这种出售获取高于其他来源的收入”。在后期的著作中,诺斯大大地改弦易辙了。在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中,他用交易成本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补充了新古典的选择理论,以此为分析框架考察了人类经济史的全过程。效率制度假设被放弃了,代之出现的是一种讨价还价理论,无效率的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常态,有效率的制度反而是例外。在其90年代的著作和文章中,他甚至走得更远。制度变迁是个人和企业家选择的结果,但大多数选择仅仅是依惯例而行的。变革需要知识,而知识的产生需要有生产知识的积累,新知识的产生还要受到决策者“心智模型”和信仰体系的影响。因此,要理解制度变迁,需要理解“观念、意识形态、神话、教条和偏见”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文化对学习过程的影响使制度变迁出现了路径依赖性,某些社会甚至被“锁定”在无效率的制度之中。10—18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是“在分崩离析的政治或经济单位的相互竞争中,信仰体系逐渐演变的故事”(诺斯,1994)。近期,因为格瑞夫理论的挑战,诺斯由开始修改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在诺斯理论中,他甚至开始使用社会—文化人的概念,投射了旧制度主义者凡勃伦、康芒斯的影子。

实际上,不同制度分析观的共同出发点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作用的关注^①。他们都认为制度制约着人类行为和经济绩效,制度是在与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演化的。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走向综合需要认清方向,需要搁置门户之见,而且需要方法论上的革新;不同制度分析观之间的差异也将会永存,因为分歧的根源来自对人的理性与文化关系的不同认识。只要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分析派别。

然而,能够看到希望的综合是什么?不同的制度分析观已经提供了答案:新制度经济学对不同制度分析观的综合应该是科斯—威廉姆森式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奥地利主义者(哈耶克的知识理论、萧尔特的制度演化博弈分析、朗格的动态化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动态化的交易成本理论)、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制度演化分析之间的综合。这一综合需要:

第一,修正对制度采取先入为主的定义,而是从新古典理性中导出制度,制度是一种行为状态;

第二,需要知识理论的支持,这是制度演化的基础;

第三,需要将组织与制度进一步分离开来,它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制度的扩展;

第四,制度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选择过程,也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历史是

^① 新古典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只是认为制度是他们研究范围之外的课题(见希克斯,1946)。

制度变迁的载体；

第五,对制度变迁过程的解释需要发展一个学习理论。

从这些主张来看,不同制度分析观是否如此尖锐对抗乃至到了不可通约的地步?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新,特别是社会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社会知识理论以及演化博弈论在经济学中日益增长的应用,不同制度理论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显露出可以调和的迹象。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逻辑维度和政策主张正在发生改写,这一改写已开始露出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成熟的经济分析必须能够兼容对人的理性和文化性的理解,不同制度分析观的交锋或较量可能有助于一种新经济学的形成。

参考文献:

埃里克·罗尔,1981,《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第588页。

加尔布雷斯,1998,《我们时代的生活:加尔布雷斯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05页。

加尔布雷斯,1965,《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7,259页。

西蒙·库茨涅兹,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

唐寿宁,1997,“立宪经济学范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June 1950): 211–221.

Ashton, T. S., 1946,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to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a*, N. S. May 1946, Vol. 13, pp. 81–96.

Coase Ronald H.,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40(March): 229–31.

Coase Ronald H., 1995, “M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 in William Brete and Roger W. Spencer, eds., *Livers of The Laure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 227–249.

Coase, Ronald H., 1998,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8(2): 72–4.

Cohen, Michael D., Roger Burkhart, Giovanni Dosi, Massimo Egidi, Luigi Marengo, Massimo Warglien, and Sidney Winter. 1996 “Routines and Other Recurring Action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ssues”, IIASA working papers WP-96-25, March 1996.

Commoms John R. 193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21: 648–657.

Coriat, Benjamin & Giovanni Dosi, 1995,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Change: An Appraisal of the ‘Evolutionary’ and ‘Regulationsist’ Research Programmes”, IIASA, WP-95–117.

David Paul A. and Peter Temin, 1974, “Slavery: The Progressive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ept 1974 Vol. 34 pp. 739–83.

Drobak, John D. and John V. C. Nye, eds., 1997, *The Frontier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Ca, Calif: Academic Press.

Eggertsson, Thrainn,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ggertsson, Thrainn, 1997, “The Old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Heft 12: Jena Lectures Max-Planck-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Economic System*.

Egidi, Massimo, 1995,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Dallago, B. & Mittone, L., eds., 1995, *Economic Institutions Market, and Competition*, Aldershot: Edward Elgar.

Egido Massimo, 1996, *The “as if” Dilemma*,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rento, Italy.

- Field, A. J., 1981, "The Problem in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ritiqu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rth-Thomas Model of Pre-1500 Europ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8; 174–98.
- Fogel, Robert, 1964,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 Fogel, Robert and Engerman, Stanley. L. 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2 Volum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 Furubotn, Eirik G., 1994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tension of the Neoclassical Model or New Construct? Heft-1; Jena Lectures Max-Planck-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Economic System*.
- Furubotn, Eirik G., and Rudolf Richter, eds., 1997,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8,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if, Avner, 1989 "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 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LIX, No. 4; 857–882.
- ,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2); 525–548.
- , 1994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912–950.
- , Greif, Avner, Paul Milgrom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4b,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Merchant Gui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4); 745–776.
- , 1996, "Micro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 Kreps and Kenneth F. Wallis eds., 1996,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A., 1952,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 Llein, Peter G., 1997b,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Practice: Applications and Evidence*,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eorgia University.
- Klein, Peter, 1998,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imeo, Georgia University.
- Kirzner, Israel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Chicago Langlois*, III.,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chmann, Ludwig M., 1971, *The Legacy of Max Weber*, Berkeley; Glendessary Press.
- Langlois Richard N. ed., 1986, *Economics as A process: Essay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lois Richard N., 1995,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What Is Still Wrong with the New)?",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270–89.
- Langolis Richard N. & Paal L. Robertson, 1995,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A Dynamic Theory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tthews, R. C. O, 1986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6(December 1986); 903–918.
- McCloskey, Donald N., 1976,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76 vol. XIV, No. 2, pp. 434–61.
- Menger, Carl, 1883[1963], *Problem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Zock, 1963,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enger, Carl, 1892, "On the Origins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Vol. 2; 239—55.
- Neale, Walter C., 1988, Institution, In Marc R. Tool, 1988, 2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ought*, Vol. 1; 227—256. M. E. Sharpe, Inc.
- Nelson, Richard R. and Sidney G.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 Thomas Robert P., 1971,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North, Douglass C., 1984,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0(March); 7—17.
- North, Douglass C., 1987,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quiry*, 25; 419—428.
- North, Douglass C. and Barry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4); 803—32.
- North, Douglass C., 1990a,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0b,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4); 355—367.
- , 1991, *Instit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4), winter 1991; 97—112.
- , 1992,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st*, XXXVI(1); 3—6.
- , 1993a,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3); 359—68.
- , 1993b,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pp. 11—23; in E. G. Furubotn and Richter, Rudolf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cent Progress: Expanding Frontier*,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printed i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 G. Furubotn and Richter, Rudolf(eds. 199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 1993c,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Long run*, Prepared for the Eighth World Productivity Congress in Stockholm, Sweden.
- , 1993d,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Presentation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Workshop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Knight and Sened, ed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 1993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a, "The Evolu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in History",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b, "Transaction Costs Through Time",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c,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olitics",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History Workshop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e, "Institutions Matter",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 1994f, & Wallis, John J.,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50; 609—624.
- , 1995, *The Paradox of West*, In *Richard Davis(ed.): 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7a,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 UNU/WIRED 1997 Annual Lecture, Friday, 7 March 1997, Finland.
- , 1997b, “Some Fundamental Puzzles i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W. B. Arthur, S. Durlauf, and D. A. Lane, eds.),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 Perlman, Mark 1986 “Subjectivism and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 pp. 268–180. In Israel M. Kirzner, ed., 1986 *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M. Lachmann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London: Macmillan.
- Vanberg, Viktor, 1994, “Carl Menger’s Evolutionary and John R. Commons’ s Collective Action Approach to Institutions: A comparison”, in Viktor Vanberg, 1994 *Rules and Choice i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eblen, Thorstein, 1898,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Reprinted in Veblen, T., 1961,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Russell & Reussell, 56–81.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2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Free Press.
- , 1985a,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 1985b,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omoting a Dialog”, in *Industries Firms and Jobs*(G. Farkas and P. England, eds.), New York: Plenum.
- , 1987,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heorie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omoting a Dialog Working Paper, ISA-RC, No. 17 Conference, July 1987.
- , 1991, *The Logic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Oliver E. Williamson and Sidney G. Winter, 1991,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Industrial and Cooperative Change*, 2(2), Reprinted in *The Mechnaisms of Governance*, W. E. William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9-249.
- , 1993,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urctural Alterna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Human Actor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mimeo.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